

# 第十三章

## 辩证法终究要战胜形而上学

### 从“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四年新春伊始，一场由“四人帮”策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海军发难了。

一月二十三日，是春节的第一天，我被通知参加海直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并说江青要亲自来参加。“文革”期间一次又一次花样翻新的运动，开始总是让人摸不清头脑。这次江青亲自来海军参加大会，举动不同寻常，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开会的时候，江青没有来，派了当时具有代理人特殊身份的迟群和谢静宜两人参加了会议，带着江青给苏振华同志的亲笔信和二百本《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并在会上作了盛气凌人的讲话。海军实际上成了江青发动全国性“批林批孔”运动的试点单位。当时，对于这场运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搞不清楚。但是，对于江青的信及其做法，我有反感。我和苏振华同志是海军的

主要领导，从党委领导来说，苏振华是第一书记，我是第二书记。江青要在海军搞“批林批孔”试点，不通过海军党委，却写信给苏振华同志一个人，而且用“派迟群、谢静宜到你的司令部来”这样的语言，是很不正常的。海军“四·五”会议以后，我被一顶上了“贼船”的帽子压着，处境很尴尬。江青的这一做法，无形中对我施加了新的压力。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江青又有代表毛主席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唱反调，苏振华同志代表党委表态，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我也做了表态性的发言。我说，我读孔老二的书很多，受的影响很深，应该好好地肃清一下。当然，我那时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理解，比之江青等人所预谋的目的，是差之千里的。

“批林批孔”运动，是江青等人策划的一个阴谋，矛头是对着周恩来同志的，一开始即有“批林批孔批周公”之寓意。江青怀着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借机进行篡权活动。对于这一切，善良的人们是不知道的，大家仍旧在盲目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当时主持海军工作的苏振华同志说，江青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向他提出要来海军搞“批林批孔”试点的问题的。因为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苏振华当时应允了江青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海军整个“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对苏振华同志的一些做法是很有看法的。海军一月二十三日大会以后，他签发了以海军党委名义给江青的致敬信，接着，

先后两次印发江青给他的那封亲笔信，散发的范围很广，在海军造成“批林批孔”的强大声势。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中央机关“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对周恩来同志搞突然袭击，很多老同志都有感觉，可苏振华同志回来却情绪激动地对常委们说：“今天的大会气氛很好”。三月份，海军召开“批林批孔”汇报会时，他把我一九七二年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代表海军的发言说成有些地方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或者对“文化大革命”抱有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也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并以王洪文“揭不开盖子要炸开”的指示为依据，不顾大多数常委同志的反对，坚持要在东航机关搞以大字报为武器的“批林批孔”试点，后来转发了试点经验。结果海军从上到下大字报铺天盖地，层层揭盖子，把矛头指向一批所谓“搞复辟倒退”的领导干部，搞乱了部队的思想，干扰了部队建设。这种做法直至一九七四年中央十七号文件明确规定陆海空军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下达后，才停止，使海军党委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一月二十八日，当南海前线军民取得了西沙海战的胜利后，江青又以她个人名义给西沙前线军民写信，派两位青年作家到前线活动，送材料，宣传“批林批孔”。六月二十六日，江青带一帮亲信乘坐海军的猎潜艇视察大港油田，在艇上大讲“批林批孔”，出尽了丑。江青的这些活动苏振

华同志都在海军部队进行了扩大影响的宣传。特别是江青看到水兵帽上的飘带，信口雌黄地说：“这是纪念纳尔逊的，是帝国主义造成的”，随手摘下一个战士的帽子把飘带放到帽子里，给战士重新戴上。苏振华同志遂正式下令剪掉了全海军士兵帽上的飘带并坚持说，“不管怎样，反正是外国的东西”，“江青同志很讨厌这个东西”。对于江青这个个人的寡廉鲜耻，我想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都不是没有觉察，而苏振华同志对江青做的这些姿态，不能不说这是投其所好的。相反，对于同年朱德同志视察海军以及观看核潜艇研制过程影片后对海军做的一些指示，他却反映极其冷淡。

一九七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的推荐下，邓小平同志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同志病重的情况下主持国务院工作。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一些关于毛主席批评江青、批评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四人小宗派问题的传闻。年底开始，中央报刊上、广播中反复宣传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的确，长达八年的动乱，国家深受其害，人民深受其害；人心思定，人心思治，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广大人民的迫切心愿。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整顿”的口号，一呼百应，受到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

热烈拥护。邓小平同志真是难得人才，敢想敢干，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首先卓有成效地整顿了铁路，接着又进行了工业，农业战线的整顿，并提出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邓小平同志“整顿”的方针，实际上是在着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们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迅速有了转机。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军队要整顿”，在这年六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整顿军队，革除肿、散、骄、奢、惰，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军队的整顿工作在艰难中起步了。我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对于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主张，我举双手赞成。我钦佩邓小平同志的勇气、胆略和魄力。但我又暗暗为邓小平同志捏一把汗，我预感一场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因为“四人帮”是不会让邓小平同志这样干下去的。一九七三年春，邓小平同志结束了“流放”江西的生活回到北京，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邓小平同志，向他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当时，正值海军“四·五”会议之后，我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向即将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暗示说：“你出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防那两个戴眼镜的。”我指的是江青和张春桥，而小平同志也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会意地点头笑了笑。那时，我仅仅是在

解放干部问题上触犯了张春桥、江青等人，就被认为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被打棍子、扣帽子。而此时，邓小平同志做的这一切，非常明显地与江青、张春桥搞的“左”的一套对着干。二者之间的斗争，已是随时可见的了。

果然，为时不久，这场预料之中的较量就开始了。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我和苏振华同志一起参加了在三座门召开的军委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宣读了以中央23号文件下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这个打招呼要点传达了毛主席对由邓小平同志转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同志写给他的一封信的批示，这封信反映了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毛主席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这个《要点》指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些实际上是把矛头公开指向邓小平同志，把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以来的工作说成是翻案。军委会议除了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外，还传达了毛主席其他一些批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如“小平偏袒刘冰”，“永不翻案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等等，并布置了回去以后向常委传达文件精神，分步骤地向各级领导同志打招呼，认真搞好“三个正确对待”，参加

##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我听了这个传达以后，好似迎头一瓢冷水，心里凉透了。几个月来，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整顿军队的大好形势下，海军的工作有了不少起色。特别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对海军说了“海军很小，敌人不怕”，“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的话以后，海军党委迅速研究了贯彻意见，苏振华同志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表示一定要“努力把海军各项工作搞好，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对此，毛主席五月二十三日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在进行了八九年的动乱以后，毛主席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又对海军做了这样的批示，我感到海军建设又有可能得到一个大的发展，心里是非常高兴的。很快，海军党委下发了文件，提出要重新修改、拟定装备、生产、科研、工程等十年规划，常委会议首先讨论了海军装备建设的十年规划。同时，抓部队技术战术基础训练，抓干部培训，抓院校建设，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部队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一切，与邓小平同志“军队要整顿”的方针是那样的合辙合拍，在部队贯彻是那样的“顺茬”。而此时，否定了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以来的工作，海军的这些工作是肯定还是否定？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都成了问题。说实在的，当时对中央的这个文件，我是很有想法的。文件说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通过他的

联络员毛远新传达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少，不能不令人怀疑。而且，我知道毛主席年事已高，病势沉重，江青、张春桥他们会不会从中做手脚，也是令人担心的事。回来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郁闷。

十二月中旬，中央下发24号文件，扩大23号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传达范围，海军也准备召开一个扩大范围的传达会议。记得在常委会讨论会议如何开的时候，由于当时苏振华同志不在京，有的同志提出要我讲一讲23号文件的重要性、意义。我几乎按捺不住满肚子的火，说“我不晓得怎样讲！一直到现在，我们连刘冰的信的内容都不清楚，不知道的不能讲。还是传达中央23、24号文件吧。”我想，当时对这事有抵触情绪的同志已是相当多的了。

此后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国运动开始了。

## 一九七六年的大较量

一九七六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天灾人祸，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新年刚过，一月八日，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悲痛的海洋。以此为起点，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斗争也逐渐明朗化了。

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任何人都不能

替代的角色，他用高超的策略和聪明才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对毛泽东同志，他既维护了其在当时不可动摇的尊严，又对其晚年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诚然，周恩来同志在那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斡旋，处境十分艰难，力不从心，但他保护了多少干部，弥补了国家多少损失，恐怕是无法估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对“左”的错误的认识过程中，越来越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越来越认识了周恩来同志的赤胆忠心，高风亮节。大家把周恩来同志视为党和国家不可缺少的顶梁柱，视为与极“左”思潮斗争的代表。而此时，邓小平同志在顺乎民心民意搞了一系列整顿工作之后，被停止了大部分的工作，“四人帮”精心策划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否定、并企图扼杀这些整顿的成果。斗争之激烈，形式之公开，都是空前的。而且，孰胜孰负，尚难预测。这一斗争的脉搏，不仅在干部中，就是在一般群众中，都不同程度地触摸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恩来同志逝世了，人民痛失栋梁。人民的眼泪，不仅是为好总理而流，也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流的啊！

周恩来同志病重的消息，我早就知道了。但听到他的逝世，我的心仍旧受到极大的震颤。回想我与总理几十年的交往之中，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格。在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下，我在中央苏区被错误打击过，周恩来同志曾经当面向我做过诚恳的检讨，使我深受感动。海军“四·五”会议，江青、张春桥逼我承认上“贼船”，也是总理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安慰，使我终身难忘。在海军建设上，总理在国家经济状况落后的情况下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海军的每一个发展规划都是他亲自过问的。一九五七年，总理亲自登舰出海检阅海军部队。在打捞“跃进”号沉船时，他亲临东海舰队，当晚听取汇报，第二天清晨就到吴淞码头，查看每个潜水员的潜水试验，以及出航准备工作。在林彪鼓吹“政治可以代替其他”，取消军事训练之时，又是总理亲自提出了步兵每年训练九十天、技术兵训练一百二十天的要求，经毛主席批准下达部队……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让我回想得心疼。而更令我焦虑的是，总理去世在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当此时江青、张春桥一伙不遗余力地打击邓小平同志的意向已很明确，大家曾寄希望于总理，保护小平同志，扼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总理去世，局势将怎样发展，实在令人担心万分。这期间，使我很得安慰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同志提议经政治局通过的代总理的人选是华国锋而不是张春桥。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对张春桥、江青的为人已有了相当的认识。

在悼念总理的问题上，“四人帮”与人民群众发生了直接的、尖锐的冲突。人民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用各种

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而江青一伙却百般压制，不许戴黑纱，不许上天安门，不许开追悼会，不许送花圈。一月十五日，总理遗体火化的那一天，首都百万人民冒着严寒，十里长街送总理。我的孩子们回来给我说当时的情景，我落了泪，为总理不朽的英魂，为人民诚挚的情感，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

“四人帮”的这些压制纪念总理的活动非但不能抵销总理的影响，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卑劣，加速了矛盾的激化，于是，有了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清明节前的那几日，我的孩子们天天去天安门，每天都回来向我谈天安门前的悼念总理的盛况，给我读抄来的诗词。孩子们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我也十分兴奋。我为我们的人民对政治风云这样深刻的洞察力，这样勇敢的精神而感到高兴。这代表人民的意志，而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固然有它的偶然性，但把它放到一个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就可以看到它的必然性。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的抗议运动，是“四人帮”违背人民意志，极力推行“左”的一套，打击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贬低周恩来同志的历史作用，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倒行逆施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群众对

“左”的错误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识之不多到识之较多，从局限于思想上的认识到借助于行动上的反对这一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这场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四月七日晚，我接到通知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会上由吴德讲了天安门几天来发生的事情，完全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接着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的精神，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说，“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会上宣布了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宣布完毕，人们鼓掌。我没有鼓掌，将手中的文件翻过一页，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看文件的样子。我认为说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没有证据，我不能同意后一项决议。

此后，形势逆转，在“四人帮”的操纵下，报纸上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从领导到群众层层搞表态活动，大搞追查“政治谣言”和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造成一种声势，强迫广大干部和群众接受“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和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处理。

七月六日，我深深敬爱的朱德同志与世长辞了。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却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使我感到格外的痛惜和忧虑。我与朱德同志相识于一九三一年在瑞金召开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从那时起，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尊敬的老首长对待。他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军队建设的卓越贡献，他那有功不居功，平易近人的高尚美德，使我为之倾心。几十年来，我们过往甚密，无话不谈。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对我个人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教益，使我终生念念不忘。“文革”以来，朱德同志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井冈山朱、毛会师这世人皆知的事实也被抹杀，说成是林彪与毛主席会师。朱德同志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从不争功诿过，冷冷地对待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文革”中，我先是受到林彪，以后又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打击迫害，我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也痛心实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目标遥遥无期地拖下去，思想非常苦闷。我曾多次找朱德同志，向他诉说自己“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心情，将自己的苦恼倾囊倒出，寻求他的帮助。我看得出来，朱德同志的心里也是同样的沉痛。但他总是缓缓地、凝重地开导我，有一句话使我终生刻骨铭心，这就是“劲光同志，在任何时候你要相信一句话——辩证法终究要战胜形而上学。”在朱德同志逝世的日子里，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我反复咀嚼着朱德同志的这句话，感

到受益无穷。的确，中国历史在反反复复之中印证着朱德同志的这一至理名言，过去的几十年是这样，以后的历史发展也同样是这样。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了使二十余万人丧生、全部建筑物毁灭的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国家处于政治上动乱、经济上不景气的形势下遇到这种天灾，人们的心中都沉甸甸的。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都在为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紧急动员起来。可“四人帮”一伙却毫不顾忌人心的向背，丧心病狂地扬言，“抹掉一两个唐山算什么”，“不能拿地震压革命”，不能“以救灾难批邓”。世上哪有这样的共产党人！

九月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又与世长辞了。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连失去了党和国家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蒙受的损失是巨大的。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这些功绩永远不能为他的错误所埋没。毛主席“文革”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我个人来说，对毛泽东同志亦怀有特殊的感情。从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毛泽东

同志当作自己敬仰的师长，可以说是在毛泽东同志几十年的帮助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此时，我是万分悲痛的。在向毛泽东同志遗体告别的时候，我痛哭失声了。人固有一死，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出毕生精力，做出杰出功绩的人，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他的。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十月四日，全国人民还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之中缓解过来，“四人帮”经过密谋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光明日报》上用梁效的名义发表了。“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已显现在字里行间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四人帮”误党误国的倒行逆施日益发展，他们要向党、向人民摊牌了。我感到到了党和人民下决心除掉这些党内蛀虫的时候了。为此，我曾两次找到叶剑英同志。第一次是在得知毛泽东同志病危的消息以后，我预料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毛主席身后会有动作，他们会借毛主席的名义干不可告人的篡权勾当。我到叶剑英同志处，与他深谈过这件事。叶剑英同志比我更知底细，他肯定了我的判断。我说，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家伙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叶剑英同志深深地点了点头，他也正在考虑着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还向叶剑英同志建议说，下命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

来。叶剑英同志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十月六日上午，我又一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同志家里，诉说了自己看了近二天来报纸上宣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文章后夜不能寐的心情，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托出。我说，事不宜迟，如果再不动手，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要动手。如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他们手里，就要走大弯路了。叶剑英同志坚毅地告诉我说，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当即拿起电话要通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说，肖劲光同志对解决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请你抽时间当面与他谈一谈。估计华国锋同志当时正忙得脱不开身，叶剑英同志让我在他处等一等。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同志再次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华国锋同志还是没有时间。临近中午，叶剑英同志留我吃饭，我没吃，就告辞了。后来，在怀仁堂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了华国锋同志，他面带歉意地对我解释说，“你那次要与我谈‘四人帮’的事，因为正在忙于布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能够与你面谈。”这一次在叶剑英同志处，我还与他谈了对海军“四·五”会议的一些看法，提出会议给我做的上“贼船”的结论是不实事求是的。同时，也反映了“四·五”会议以后，与苏振华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一些分歧。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军委开会传达中央23号文件，即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散会以后，我与苏振华同志走在一起，考虑到下一步在海军的传达工作，我对他说，刘冰的信写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说邓小平同志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这件事我们不要抢先，看看情况再说。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思想上存有疑虑，另一方面是因为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苏振华同志积极倡导在海军贯彻邓小平同志“整顿”的方针，海军党委内部思想比较一致，工作是有起色的。此时，如若贯彻《要点》精神，意味着下一步的工作必须转向，这是一个很大的弯子，不管怎样，慎重为好。但是，我的这个意见并没有被苏振华同志采纳。十二月份，海军准备召开扩大传达中央23号文件的会议，苏振华同志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要有个代表常委的发言，重点讲清伟大意义，把主席指示讲清楚；当前这个翻案风要制止，不制止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巩固。当前这个翻案风就是搞复辟，讲清危害；讲清为什么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此后，他领导海军积极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亲自带领海军党委常委去运动的先行点清华大学参观“批邓”的大字报，在参观中做指名道姓的“批邓”讲话，调子很高。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了“两个决议”，海军又很快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同志在书面发言中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法西斯暴行”，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等等。以后多次讲话超过了中央的提法，“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毛主席的指示，又有“四人帮”制造的强大政治压力，绝大多数不具备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胆略的党的领导干部，受传统的纪律约束，针锋相对地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唱反调是很难做到的。我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中央的调子讲话。”但是，历史发展到一九七六年，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在用或明或暗的各种方式拥护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抵制“四人帮”的“左”的一套，即使是不得不说违心的话，表态也都十分有限，有的干脆沉默不语。而作为一个一九七五年曾积极拥护过邓小平同志“整顿”方针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苏振华同志的这些表现，使人想法很多，也很难让人理解。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对叶剑英同志说，如果在对待“四人帮”这个问题上，苏振华同志的态度明朗，我们过去的一切分歧都算不了什么，可以不提了。叶剑英同志要我与苏振华同志当面交换一下意见。并就“四人帮”的问题向他吹吹风。从叶剑英同志家里出来，我径直来到苏振华同志家里。他由于生病在家，对中央准备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将在叶剑英同志处谈的这些

意见开诚布公地与苏振华同志谈了。我还向苏振华同志谈了“四人帮”有野心、有问题，并转达了叶剑英同志的意见。苏振华同志听后对我说，你说话要谨慎，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我得知中央正在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以后，心里无比兴奋，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我回来后的当天夜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的措施，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四人帮”，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以党和人民的胜利载入史册。浩劫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了。

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对酒高歌。“文革”十年以来的沉闷空气被打破了，禁锢人民精神的枷锁被解除了，人们发自内心的高兴不可遏止，纷纷上街游行，庆祝胜利。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走过了十年艰难的历程，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之时。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是值得大庆特庆的。

## 结束两年徘徊局面的斗争

雨过天晴了，可暴风雨劫后的修复工作还要经过相当的努力；“四人帮”被粉碎了，而党要医治十年浩劫的创

伤，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华国锋同志主持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客观上为全党纠正“左”的错误设置了障碍，使党又走了两年曲折的道路。

一九七七年初，人们从粉碎“四人帮”后的兴奋之中渐渐冷静下来，热切地期望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能够拨乱反正，拿出治国大纲，迅速扭转形势。国家百废待举，究竟什么是扭转形势最根本之枢纽，不仅群众不明白，党亦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个在当时看来似乎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理所当然，却实际上是拨乱反正的障碍。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诤、耿飚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整顿是正确的，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而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不能以凡是毛主席说过的事就一成不变。对天安门事件，我们老同志也有所议论，认为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都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

也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

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记不清具体是在那一天了，王震同志打电话邀我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诤、耿飚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同志也来了，陈云同志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个书面发言。他对坐在旁边的我说：“请劲光同志给大家念念吧。”这篇书面发言，主要内容就是现在收集在《陈云文选》三卷中“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文章不长，我权将摘录如下：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同志旗帜鲜明的发言稿，说出了大家心声，博得了一致的赞同。这个书面发言，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于华国锋同志仍旧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是，对华国锋同志坚持的“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陈云、王震等同志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唱了反调，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唱了反调。这次会议，尽管还没有实现解决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这两件大事，但在党中央委员会内将这两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改变了一家之言的局面，毕竟是进了一大步。

五月份，中央转发了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这使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之感。多少年来，“左”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不就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毛泽东思想，奉若神明的错误概念吗？人们恪守着这个信条，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林彪、“四人帮”却利用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

把毛泽东同志晚年一些错误的东西也奉若神明，甚至伪造毛泽东同志临终嘱咐，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点不破除，就无法继续前进，而怎样破除，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首先要有理论的准备，这一理论要战胜多年来肆行无忌的、成为体系的“左”的理论，不仅需要勇气，而且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有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正是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一番斗争，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实际上为党找到了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枢纽，抓住了扭转局势的关键问题。由于华国锋等同志仍旧推行“两个凡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了。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和全国一样，海军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过程中，也遇到了严重阻碍，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海军受到这一“左”的错误的影响是深重的。当时主持海

军工作的苏振华同志，从指导思想上接受并积极推行华国锋同志“两个凡是”的方针，开始是坚持“批邓”，以后又反对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压制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积极搞对华国锋同志的新的个人崇拜。而华国锋同志一九七七年初对苏振华同志做了“振华同志与‘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决的”批示，这个批示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掩盖了苏振华同志“左”的错误，对海军产生了恶劣影响，同时，对苏振华同志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也是很有害的。以后苏振华同志借助这个评价继续推行“左”的一套，犯了严重的错误，严重阻障了海军拨乱反正的工作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点。对很多同志来说，也是记忆犹新的。

海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了“揭批查”运动，揭批“四人帮”插手海军的罪行，很自然地牵涉到海军“四·五”会议以来苏振华同志追随“四人帮”所犯的一些错误，有的同志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他。但苏振华同志以“两个凡是”为根据，凭借华国锋同志对他的“评价”，非但不检查纠正这些错误，反而打击揭发他错误的人，在海军抓所谓“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应该指出的是，有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通过“揭批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些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也应当有深刻的认识。问题是在“揭批查”中采取了“左”的做法，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开始的“查

“整改”运动，原是为了总结 160 舰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整顿部队作风纪律，恢复健全规章制度，解决部队的实际问题。而苏振华同志却出于个人的需要，改变了“查整改”原定的内容和重点，推行“左”的做法，搞扩大化，并借此机会打击一批与他有不同意见，揭发他的错误的同志，动辄点名批判、宣布停职、撤职、隔离审查，甚至逮捕。错整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严重的后果。

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以后，为了纠正华国锋同志推行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七八年他针对海军出现重大事故的问题对海军工作作了一些批评。苏振华同志对批评不服，心怀不满，到华国锋同志那里告状，华对苏表示支持，他们还单独商定检阅海军事项，并于一九七八年四月擅自着手调集海军大量舰艇北上旅顺演习，准备华国锋同志检阅。实际上是对批评做出的一种姿态，动机是不好的。而且，苏振华同志是海军政治委员，搞这样大的军事行动，事先不与我这个司令员商量，也不向总参和军委报告，是很不正常的，政治上是错误的。华国锋同志虽是军委主席，但批准这样大的军事行动，不经军委集体讨论，不经过具体业务部门，也是很不正常的。当我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指示有关同志去军委、总参报告，我也马上直接打电话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以后，经军委领导同志研究，认为海军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在旅顺搞演习、检阅不妥，制止了这项错误行动。

一九七八年五月，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海军迟迟不表态，当海军有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苏振华同志却说，“你们也不看看形势，中央没有表态，弄不好要犯错误。”压制了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对于苏振华同志在海军的这些事，我是提过不同意见的，也曾向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反映过。海军的许多同志对其错误是有抵制的。但是，苏振华同志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且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搞家长制，一言堂，压制民主，凌驾于党委之上，打击提不同意见的同志，以致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一九七九年一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苏振华同志的错误提出批评，王震同志也提出分量很重的批评时，苏振华同志仍不接受意见，甚至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批评他要通过中央。当时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同志十分严肃地说，“你要考虑你问题的性质”。鉴于苏振华同志的错误对海军影响很深很广，搞乱了部队的思想，伤害了许多干部，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败坏了党的传统作风，严重影响了海军的安定团结，一九八一年，军委办公会议为解决苏振华同志的问题专门发了（1981）16号《纪要》。接着海军也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纪要》，对此，我是很拥护的。我认为，苏振华问题既然发展成为严重影响海军建设的问题，那么，正确的态度就不是回避它，

而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苏振华同志是个老同志了，几十年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对党、对人民、对海军建设都是有贡献的，不应该因为谈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功绩。“文革”初期，苏振华同志受到残酷斗争，我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所以，一九七三年初，当我收到其家属为苏振华同志申诉的信时，立即设法转给了毛主席。后来，当叶剑英同志征求苏振华同志工作的意见时，我当即表示欢迎他回海军工作。苏振华同志重回海军工作，同志们都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从海军“四·五”会议后期开始，他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犯了错误，对海军的影响十分深重。我认为，在今天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错误，一方面是为了正确认识海军的这段历史，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而并不是为了追究个人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振华同志犯错误，既有客观历史原因，即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又有主观思想原因，即私心太重。是不是政治品质问题，我想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这些对我们，包括我个人，都是有经验教训可借鉴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应当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之目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使我感到十分兴奋的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还审查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任务，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使我感到十分兴奋的还有一点，就是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战略决策。我感到全会是务实的，它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从此，结束了两年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军队也才有可能理直气壮地搞国防现代化，三十年中的曲折和挫折，使我对这点感受特别深刻。记得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参加了军委座谈会，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顿军队，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讲话。回来以后，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我一面传达了军委座谈会议精神，一面从海军的战略任务、作战指导思想、基地工程建设重点、武器装备生产、部队训练、院校教育、编制体制以及兵役制度七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今后海军建设的意见。

后写成报告上报邓小平同志并转呈华国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领导同志，表达了自己急于加速海军建设的心情。当然，在当时“左”的错误尚未结束的情况下，要想加速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进行全面拨乱反正的总形势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海军也才有可能逐步走上了纠正“文革”以来“左”的错误和拨乱反正的道路，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而得到迅速的发展。三十年的历史，海军走了一个多么曲折的螺旋形，终于又回到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思想上来，这真可谓“否定之否定”。它说明，辩证法终究要战胜形而上学，这是规律。